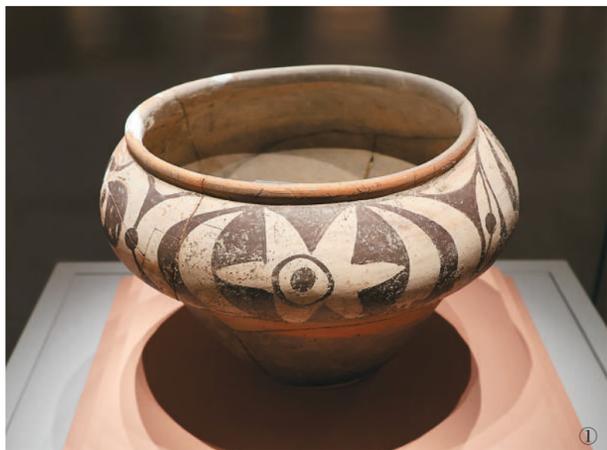


秦晋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

勾勒“最初的中国”发展脉络

本报记者 张丹华文/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绵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17年“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接续推进，两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多学科合作的科学方法解码文明起源进程，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聚184件（组）珍贵文物，通过“缘起篇”“探索篇”“回顾篇”“拓新篇”4个篇章，系统呈现了“十四五”时期秦晋豫三省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演进图景。

“陕西、山西、河南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串联起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融合的脉络。”展览策展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倩说。

满天星斗 早期礼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等地逐渐崛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区域文明竞相争辉，宛如满天星斗。秦晋豫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格外兴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为早期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礼制萌芽，高等级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彩陶、玉器、玉器礼器性器物的使用，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出现等级分化，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开始形成。”张倩介绍。

陕西西安皇子坡遗址是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拥有一大一小双重环壕。壕内有房址、陶窑、窖穴、蓄水池等各类遗存，功能完备。外壕两处门道外则各连接一段短沟，形成类似“瓮城”的防御结构。

崔家河遗址是山西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中心聚落，繁盛于庙底沟文化时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遗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鱼纹彩陶盆很特别，为泥质红陶，腹部绘写鱼纹。这种纹饰在庙底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年代早于庙底沟文化、以渭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这件陶盆宽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庙底沟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见，而与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形制相似，显示出多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现象。

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发现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半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复原面积接近250平方米。该遗址中大型房屋数量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

交融共进 “河洛古国”问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发展迈入“文明并起、交融共进”的阶段，以玉礼、陶礼为代表的成熟礼制系统逐步形成，聚落等级分化愈发显著，初具国家形态的区域文明在互动交流中不断发展。

“与其他区域相比，这一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更为朴实内敛，大型墓葬的随葬品未出现过度丰富的情况。这种特质让中原文明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为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张倩说。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聚落，现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灰坑、陶窑、瓮棺葬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与该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相比，蒋刘遗址的环壕规模更大，墓葬等级差异更为明显，显示出社会等级分化加剧、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

山西夏县辕村遗址距离运城盐湖仅4000米，遗址的形成、变迁与先民对盐业资源的开采、利用息息相关。辕村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环壕聚落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环盐湖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发现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迹。辕村遗址出土一类造型独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较直，据推测可能与盐业资源的储藏有关。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聚落，总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学者推断其为“河洛古国”的都邑。聚落中心区域有内、中、外三重环壕，内环壕里分布着高等级大型院落、祭坛、中心居址以及带有瓮城结构的夯土围墙等，布局完整、功能完备，体现出“中轴对称”的建筑规划理念。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引人注目。其为泥质红陶，上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绘圆点、弧线三角等图案，使白色底纹形成弯月、六角星等纹样。这类星月纹彩陶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同时，在双槐树遗址及邻近的荥阳青台遗址均发现了将多个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摆放在一个特殊区域的现象。由此可见，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对天文星象有所关注和认识。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体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逐渐式微，而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则加速发展，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中华文明进程迈入新的阶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继问世，完整的城防系统、宫殿式高等级建筑、规范化的礼制器物，标志着文明形态和礼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这一阶段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强大组织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区域文化中心，而是成为文明整合的核心枢纽，通过吸纳、融合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壮大自身，进而对周边地区产生持续的文化影响。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由此奠定，为王朝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倩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这一时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围护，分为“皇城台”、内城与外城三部分，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墙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遗址内出土的石雕人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高等级器物，以及“藏玉于墙”等特殊遗迹，凸显出石峁遗址作为北方跨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独立展柜中的鹰纹玉钺，是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钺呈倒梯形，边缘一周

分布多个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减地雕刻精美的鹰纹。鹰首高昂，双翅张开作翱翔状，鹰四周点缀卷云纹。张倩介绍，鹰的形象亦见于石峁遗址陶器中，推测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图腾”。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学界推测其可能为夏早期都城。遗址内城墙、祭祀区、排房式居址、手工业区及壕沟类水利设施一应俱全，出土了工艺复杂的玉器、蛋壳黑陶等高等级器物以及具有礼器性质的陶鼎、陶罐等，还发现了五谷（粟、黍、稻、麦、豆）与四畜（牛、羊、猪、狗）遗存，反映了其坚实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展览中可以看到瓦店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礼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釜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备“列器”的性质。

除了这些核心都邑，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碧村遗址是与石峁遗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为石峁古国东部的战略关口和军事屏障，与石峁形成“都邑一边关”的两级政治结构，为探索早期国家边疆管控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八里坪遗址地处“太行—沁河”通道的关键节点，成为沟通东西、连接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重要枢纽。

科技赋能 解开文明密码

田野考古的手铲，勾勒出“最初的中国”轮廓；而多学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细的笔触，描绘出鲜活立体的早期文明图景。

展览最后一个篇章“拓新篇——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探索”呈现了考古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多学科融合是当下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十四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研究中，精准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居所建造、迁徙轨迹、劳动分工等，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遗迹讲述丰富的故事。”张倩说。

考古学家对瓦店遗址出土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检测，解码了当时的食物结构——当地居民以粟为主要食物，肉类摄入较少，少数高等级群体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类，这是史前社会等级分化的有力实证。

对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营造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烧料礓石和黏土作为胶结材料，并掺入烧制过的陶粒作为骨料，致密坚硬，其结构特征与现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发现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复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烧料礓石制备的石灰浆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传，探源永无止境。希望观众通过此次展览，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国’，感受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的独特魅力。”张倩说。

图①：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纹彩陶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②：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鹰纹玉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图③：展厅一角。
图④：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 家风家训

吕坤：修格致诚正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

陈华伟

“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明代大儒吕坤《呻吟语》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君子“做天下好事”的磊落气魄，在4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掷地有声。吕坤是明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为官清廉，品德高尚，学问渊博，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赞其学问经世求实，有复兴洛学之功。吕坤留下的一系列著作，凝聚了修身齐家、明达体用的智慧，在今天仍有独特的价值。

吕坤出生于河南宁陵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吕得胜重视童蒙教育，精心编写了《小儿语》等读物，以儿歌的形式教导孩童学习和成长。吕坤遵循《小儿语》的模式，写成《续小儿语》，此外，他还改写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童谣，编为《演小儿语》。吕坤在《续小儿语》中提出“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勉励后辈一心向好、修身成材。

吕坤认为“万善百行，惟孝为尊”，他的孝行记录于《宁陵县志》，流芳后世。自年少时，他就悉心照顾多病的母亲，甚至自己钻研医术。其母病重时，他“日夜侍侧，衣不解带，尝药尝羹，忧勤毕集”。在《呻吟语》中，吕坤阐述了对孝道的思考：“孝子之事亲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最高的孝，是体察父母未言之心意；其次是继承父母的志；再次是恭听父母的命。在他看来，只要用心至诚，就能体悟到父母没有明确表达的意愿。

“生儿失教岂慈亲，肖子何劳父费心。既要叫他知义理，如何使我不辛勤。”吕坤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著有多篇教育孩子为人之道的诗文。他在《九儿入学面语戒之》中告诫子女“修格致诚正之身，任天下国家之重”，强调通过修身致知实现自我完善；在《知耻说示儿》中指出，真正的“耻”不在于物质不如人，而在于学问、才识不如人；在《择交说示儿》中强调结交“德业劝你成就，过失责你改图”的益友。

吕坤将“诚敬”视为为人之本，倡导通过真情实感的互动，培养子女的同理心与责任感。他反对高压式教育和“言过其行”的虚伪训导，主张“家教宽中有严”，强调以身作则、知行合一，认为“其要在尊长自修，长辈要端正自身、树立表率，赢得后辈的尊重”。

任山西按察使时，吕坤为传扬其父吕得胜（号近溪）的教诲，刻《近溪隐君家训》碑。此碑现藏于山西太原永祚寺内，碑文200多字，以朴素的语言教育子孙按照儒家道德伦理为人处世，如“干公道事，做老成人，说实在话”，又如“处世要俭，与人要丰，见善就行，有过便认”。

吕得胜热心于宗族事务，吕坤遵循父亲的嘱托，积极投身宗族建设，通过加强教育、涵养家风，推动家族兴旺发展。他效仿宋代名臣范仲淹置办“义田”之举，购置“孝睦田”，希望以这些田产养恤族人，弘扬孝悌之风，促进家族和睦。他将乡约与保甲制度结合，推行《乡甲约》，设立具有教化作用的宗约所，使宗族管理更加规范与制度化。他还编撰了《宗约歌》85首，以通俗易懂的歌谣形式，劝诫族人修身养性，行善积德。

吕坤提出“吾辈此身原是天下之身”，主张将个人修身与济世安民的社会责任结合，“消尽自私自利之心，浓敦公己公人之念”。他将“任途四美”“宦门四孽”的箴言刻于祠堂之前，教育吕氏子孙为官爱民、正直清白、不慕荣华、公私分明等。

受良好家风熏陶，吕氏家族人才辈出，昌盛数代。其家家训不仅泽被子孙，也对明清时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曾国藩、理学家陆陇其等，都将《呻吟语》奉为修身圭臬。“兰芳不灰谷幽，君子不为名修”。如今，当我们阅读吕坤饱含哲思的文字，仍被其清风亮节与家国情怀所感动。

国家典籍博物馆：

科技赋予典籍新活力



日前，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撷珍与雕塑艺术特展”“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典籍里的书院”等展览，通过VR实景参观、雕版印刷互动、3D打印等富有科技的方式，为典籍赋予新的活力。

图为观众在“既往未来——小西天文物撷珍与雕塑艺术特展”体验VR实景参观。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